

农村城市化研究



主 编
郑弘毅
副主编
夏 清 叶冬青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财 B0108034

农村城市化研究

C1286/09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

登录号

166688

分类号

F292.27

主 编

郑弘毅

副主编

夏 清 叶冬青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小城镇集聚与扩散的机制、指标体系以及地域差异,并对农村城市化几个主要研究方向问题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的研究突破了“就城市论城市”的观念,已从城市—区域这个视角来研究城市。当前农村城市化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书是研究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书可供经济地理、城乡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专业研究人员、政府机关、部门和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农村城市化研究

主 编 郑弘毅

副主编 夏 清 叶冬青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54千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305-03149-6/K·216

定价:15.00元

主 编 郑弘毅

副主编 夏 清 叶冬青

撰稿人 (以撰写章节先后排序)

郑弘毅 夏 清 叶冬青 武廷海

寿国靖 黄春晓 崔功豪 沈洁文

宁越敏 陈先毅 李王鸣 谢良葵

马裕祥 宋迎昌 蔡建明 张 军

刘燕丽 周一星 陈佳源 林 忠

阎小培 薛德升 许学强

绘 图 顾国琴

序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蓬勃生机,现正处在加速工业化的经济起飞阶段。1981年~1990年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3%,1991年~1995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1.6%,其增长速度已跃居亚洲和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近年来为促进经济的协调、持续、快速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使经济继续保持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周边原先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相比较,堪称举世瞩目的奇迹。

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必然会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95年为29.04%,比1980年的19.39%提高了9.65个百分点,而在这以前自1952年至1980年的28年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只提高0.25个百分点。再从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来看,当城市化水平进入30%以上的中期发展阶段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呈不可阻挡之势。预计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有可能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以上,亦即每年将有1000多万的乡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像我

们这样一个至今仍拥有 8 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由乡村向城市或城镇的大规模人口转移,将对全国甚至全球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将采取何种人口转移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已成为国内外有关学术界共同研究探索的热点,亦为国家和政府决策部门十分关注的重要社会课题。

“农村”和“乡村”这两个名词概念在我国经常被相互通用或混用。因而,“农村城市化”和“乡村城市化”属同一涵义,均指由所从事农业为主的居住较分散的农村或乡村,向以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居住相对较集中的城镇或城市转变。只是在近十多年来,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有不少农村实现工业化,当地居民不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但其居住和生活方式仍然达不到城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纯粹从字义上理解,正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的某些乡村,似不宜再称其为农村。故用“乡村城市化”比“农村城市化”的涵盖面要广,可包括已实现非农化的乡村地域如何进一步实现城市化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有反对“乡村城市化”的提法,主张以“城乡一体化”替代“乡村城市化”。其实这是混淆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范畴。城市化是指由乡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由乡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乡村城市化决不意味着将所有乡村都变为城市,而只是有较多的分散于乡村的人口向城市或各种新兴的城镇型居民点集聚的一个过程。即使在已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会有不少人居住在乡村,也仍然需要有人从事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只不过这些人也已有可能分享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某些文明成果。“城乡一体化”主要是强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

双向流动,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促进乡村地域的城市化,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文明差距。

城市化存在着经济和人口空间转移的两种基本形态和两种动力源。一种情况是大量不再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涌向既有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经济和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但由于过度集聚而引起的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负效应,则将导致经济和人口由密集的市区向郊区和周围地区扩散,从而推动周围地区的乡村城市化。以上主要动力均来自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来自于城市对乡村的巨大吸引力和辐射力,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另一种情况是,利用广大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发展市场流通,发展乡镇企业,实行就近的空间转移和小规模的适当集聚,促进众多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主要来源于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被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当然,就具体地区的城市化而言,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动力在同时交叉起作用。广义的乡村城市化,包含了以上两种动力作用和两种空间运动形态,完全等同于通常泛指的城市化。狭义的乡村城市化,则主要指乡村地域的城市化,侧重于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后一种空间运动形态的城市化。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具体划分乡村地域和城镇地域有相当难度,于是又产生一个“乡村地区”的概念,即指虽包含有众多小城镇,但仍以乡村人口为主的地区,统称为“乡村地区”。研究乡村地区的城市化,除将大城市郊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地区特殊对待外,应重点探讨广大乡村地区如何发展小城镇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某些县或县级市的中心城镇有否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好广大乡村地区如何逐步实现

城市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问题。

经济和人口的空间转移,是趋向集聚还是扩散?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转移?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对区域的城市化有重大影响。如果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集聚是主要倾向,那么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晚期,扩散又成为主要倾向,而在更多的场合,是在集聚过程中有扩散,或在扩散过程中有集聚,远近距离的转移兼而有之。正在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对全国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重要经济核心区,是我国当前城市化水平最高、城镇最密集的地区,也是乡镇企业最发达、乡村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正是经济和人口空间集聚与扩散现象同时并存,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和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交叉作用,城乡互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弄清这些地区的城乡发展趋势和空间演化规律,将具有难以估价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1993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南京地理所、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中山大学、广东省科学院等单位从事区域与城市研究的一些专业人员,共同联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的机制和调控研究”的项目申请,很快被批准立项,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城市地理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根据课题总体设计要求,对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一方面按国内外宏观背景、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大中城市和乡村城市化等不同地域层次进行纵向和专题研究,深入探讨在不同层次的空间结构演化趋势中,集聚与扩散的动因机制与调控对策;另一方面,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大块城镇密集的经济

济核心区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揭示空间集聚与扩散的一般规律在各地区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探索因地制宜的空间结构优化模式。各单位参加此项目研究的专业人员经过三年多的精诚合作和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此项重要研究成果,已于不久前通过了结题验收,现在正进行正式交付出版前的最后统一修改加工。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科学系的郑弘毅教授承担了上述重点研究项目中有关乡村城市化的专题研究。他组织专业力量,不仅完成了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所要求的专题研究报告,而且还充分利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写出了自成独立体系的洋洋 25 万字的《农村城市化研究》学术专著。尽管在国内论及农村城市化或乡村城市化的文献已发表不少,但完全以此命名,进行系统阐述的学术专著毕竟还是第一本。由于本书的写作与前述重点项目的研究密切结合,因而在乡村城市化分析中,突出了对经济和人口空间集聚与扩散机制的探讨,从而使本书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具体案例研究中,仅限于东部沿海的较发达地区,未能反映内地不发达地区乡村城市化的规律,又是本书的不足之处。然而不容否认,本书的出版,对今后进一步深化乡村城市化的研究,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考虑到我是该重点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要我为本书作序,我亦不便推辞。但由于时间所限,来不及认真拜读全书,因而也无法对该书内容详加评述。在此只能作些借题发挥,是为序。

胡序威

1997 年 8 月于北京

前 言

笔者于1994年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胡序威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点项目：“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的机制和调控研究。”该项目研究的主题是在进行宏观背景分析的基础上，按照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大中城市、农村城市化（即小城镇发展）三个层次，选择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对比研究。我们从开展样本点调查、问卷调查和面上调查入手，在此基础上，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概括和总结，上升至理论，继而深入探讨其空间结构演化的客观趋势、动力机制和调控对策。该课题研究任务于1996年底完成，1997年年中通过了验收。

笔者在这一个课题中负责第四部分，即农村城市化研究。这部分工作是在对农村城市化科学界定的基础上，研究了城、郊、乡三元地域结构，强调了城乡的互动作用，探讨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制约机制、运行机制和效益机制，为促进农村地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对策措施。

本课题自始至终是在胡序威先生领导下，由全国多所高

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参与。在课题完成之后,我们利用研究的成果编纂了本书。胡序威先生又为本书作序,特在此诚致谢意。

全书共分六章。各章节执笔人员是:第一章郑弘毅(南京大学);第二章夏清(南京大学);第三章叶冬青(南京大学);第四章第一节武廷海(清华大学),第二节寿国靖(南京大学),第三节黄春晓、崔功豪、沈洁文(南京大学),第四节宁越敏、陈先毅(华东师范大学),第五节李王鸣、谢良葵、马裕祥(杭州大学);第五章第一节宋迎昌(北京地理研究所),第二节蔡建明(北京地理研究所),第三节张军、刘燕丽、周一星(北京大学);第六章第一节陈佳源、林忠(福建师范大学),第二节阎小培、薛德升、许学强(中山大学)。南京大学顾国琴同志协助绘图。在课题研究和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建设部规划司区域处张勤处长和沿海各省市计委、建委、土地局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对农村城市化问题研究的时间还不长,编者水平有限,实践经验不足,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祈望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郑弘毅

1997年11月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篇 总 论

第一章 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理论和基本特征	(3)
第一节 农村城市化的产生	(3)
第二节 农村城市化的内涵	(6)
第三节 农村城市化的理论	(8)
第四节 农村城市化理论的发展	(13)
第五节 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17)
第六节 对我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19)
第二章 农村城市化机制、类型与调控	(22)
第一节 农村城市化机制	(22)
第二节 农村城市化层次与类型	(38)
第三节 农村城市化的前景展望	(50)
第四节 农村城市化调控机制	(62)
第三章 农村城市化指标体系	(68)
第一节 农村城市化指标体系研究概况	(68)

第二节	农村城市化指标体系研究的地域范围 及主体内容	(81)
第三节	农村城市化指标体系的特点、功能及 构造	(86)
第四节	统计指标系统	(90)
第五节	评价指标系统	(96)
第六节	管理指标系统	(106)
第七节	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	(113)

第二篇 分 论

第四章	苏浙沪地区农村城市化	(121)
第一节	江苏沿江地区农村城市化	(121)
第二节	江阴市域人口和经济的集聚与扩散 机制分析	(134)
第三节	常熟市支塘等三镇农村城市化	(184)
第四节	上海郊区农村城市化	(195)
第五节	浙北地区农村城市化	(222)
第五章	京津和辽中南地区农村城市化	(238)
第一节	北京郊县农村城市化	(238)
第二节	天津郊县农村城市化	(255)
第三节	辽中南腾鳌等三镇农村城市化	(270)
第六章	闽粤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	(304)
第一节	闽东南地区农村城市化	(304)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	(328)

第一篇 总 论

第一章 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理论和基本特征

第一节 农村城市化的产生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城镇数量增加及其规模扩大,人口向城镇集中,城市物质文明和文化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农村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侧面。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城市化的特点及表现形式不同;在相同阶段,也存在着地域差异。大致看来,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城市往往立足于农村,控制着农村,城市化主要是城市在深度上的发展。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城市的增多,城市化就不得不扩展到农村这一更为广阔的区域,广度上的扩展便逐渐成为其主要的方面。显然,城市化涉及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社会地域,它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空间过程。农村城市化的产生与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的城乡关系有关。

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由若干自给自足的农业区域组成,它们依靠封建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千年不坠,其中,城市就是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网络的据点,政治地位的高低直接决定城市的兴衰。鸦片战争以来,尽管一批通商口岸城市兴起,打破了原有格局,但这些城市旋即又被纳入中央集权的政治网络之中。简言之,传统中国“积乡而成”,城市统治着乡村,城市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导向,城市化基本集中在城市地区,城市化水平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以迅速扩大国民经济的增长,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49年~1952年,正值国民经济恢复阶段,通过多种形式(预购、现购、代购)和多种商业渠道(国营、合作、私营)的促进,城乡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城乡联系并不活跃。1953年~1957年,伴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工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基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增长模式。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是需要足够的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其主要来源只能是吸收农业剩余资金和劳力,为此,农村大量的资金和城市建设所必需的劳力输出;并且,为了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城市利益),为了工业发展,农民还“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初步形成了非均衡的城乡联系格局的组织制度。可以说,建国初的八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城乡联系一步步的走入了具有“城市—工业”偏向的非均衡状态,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在城乡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从1958年开始,城乡关系的非均衡性逐渐确定下来。